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clock tower, likely the Spasskaya Tower in Moscow, featuring a large clock face and a star on top. The style is a soft, painterly sketch in shades of pink and purple.

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

——
列宁文化思想研究
——

韦定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

——
列宁文化思想研究
——

韦定广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韦定广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01-009848-7

I. ①后… II. ①韦… III. ①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A82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2934 号

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

HOUGEMING SHIDAI DE WENHUA ZHUTI

——列宁文化思想研究

韦定广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0

字数:420 千字

ISBN 978-7-01-009848-7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自序

—

本书的研究与写作,缘自20年前的一次偶然阅读。

1978年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可能出于政治辩护的需要,经常有“权威”学者引用列宁晚年《论合作社》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的任务大体结束以后,俄共(布)应该将工作重心转移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为了与我们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呼应,许多人将此处加引号的“文化”解释为经济。1990年我读到了这一观点,但有点好奇:明明是“文化”,怎么能解释为经济呢?如果指的是经济,列宁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经济”这个更容易明白的概念呢?好奇心驱使我找出列宁的原文,在仔细阅读后发觉:“文化”就是文化,而且只有作文化来理解才能真正体现列宁在文中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的深刻蕴含。^①

文化就那么重要?

为什么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文化”,就意味着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的“根本改变”?

那时我在职业与专业两方面刚“改换门庭”,如果从研究角度衡量,仍基本属于“门外汉”。所以,很为自己的这一多少具有挑战学界

^① 具体情况,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权威”意味的小小发现而兴奋。本打算为验证“发现”进行更广泛的阅读,后来却因兴趣转移而作罢。但上述困惑始终存在,并时而有所关注。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文化热”重新燃起,特别是重点论及共产党执政中的文化建设问题。命题本身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性文化建设;二是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后者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性。共产党执政始自列宁时期,那么,列宁是如何认识俄共(布)自身文化状况及其执政效应的?

2001年,国内有关部门要在湖南长沙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会议涉及这方面议题。于是在深入阅读和研究基础上,写出了《论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一文。论文提交大会后,获得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与好评,认为提出了一个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主题,是对列宁研究的贡献。文章后来又被上海市前市委书记汪道涵先生推荐给一个内部刊物发表,并因其重要“资政”价值而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①一篇论文的容量毕竟有限,远不能系统概括和反映列宁这方面的重要思想;而“初战告捷”又增添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热情与愿望。但是在2001年,我个人的“工作重心”却在全球化方面,特别是申报的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刚获得立项,所以一时还顾不上。2004年初上一个国家课题完成,随即以“列宁文化思想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顺利通过评审,由此使阅读和研究才得以正式全面展开。

二

作为国家项目启动于2004年5月,但整个研究却达7年之久。在此期间,一方面各种干扰不断,致使项目几乎成为“马拉松”工程;另外

① 此文后来以《论列宁“遗嘱”的文化内涵》为题,正式发表于《学术季刊》2002年第1期。

更重要原因,在于问题本身的多重复杂性。

——列宁有关文化的论述既贯穿整个理论生涯,同时又很零散;不但与对经济、政治等问题的论述混合在一起,而且经常是以只言片语形式夹杂于字里行间。列宁的全部文献多达二千几百万字,而要将其文化思想在“剥离”基础上再仔细耙梳整理,确实是一件既十分繁重而又非常麻烦的工作。

——列宁不是纯粹的理论家或思想家,他首先是革命家、政治家,有关文化问题的论述都是与其政治活动、社会实践甚至具体的人和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破解其文化思想,就必须“还原”历史事实与过程。完全还原不可能,但至少需要努力地贴近。然而即使努力“贴近”,又谈何容易?!因为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无论俄国的革命与社会发展实际进程还是俄共(布)的历史,由于史料的关系而如云遮雾罩一般模糊。

——文化研究从概念到理论或方法,从来存在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象;更何况在20世纪初,文化学本身还是一门很不成熟的学科。所以在列宁著作中,无论对于“文化”概念的使用还是一些基本提法,都需要联系上下文甚至写作背景作仔细甄别才能判定其具体所指或基本含义。

——如何具体阐述与恰当反映本书主题?文化渗透于经济、政治或人的具体行为;至于隐型文化,更是以“百姓日用而不知”方式存在于甚至已成为民族心理。如果仅是抽象地概括与总结,极有可能陷入盲人摸象之困境。马克思曾经形象地形容过:精神一离开物质就要出丑。本书特点之一,是尽可能结合具体的经济与政治;然而恰如当下文化学研究状况所显示,要持之有据地论述文化与经济或政治之间关系,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

所幸的是,虽历经艰难毕竟还是完成了。

三

中国文化崇尚“正名”，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本书取名“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意在强调落后国家建设过程中文化问题之独特与重要。

孤立地看，“后革命时代”是一个多少有点模糊的提法。但联系本书内容，内涵却是明确的：所谓“革命”，就是指俄国的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时代，从理想目标与实际进程分析，就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列宁最后在“政治遗嘱”中的正式用语。其实这不但是俄国革命后面临的任务，也是 20 世纪大多数落后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获得成功之后，所希望实现并且努力实现的目标。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俄国“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质，是将所要实现的目标简单理解为制度变革，即只要建立起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也就成功了。但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警告人们：这只能属于“左”派幼稚病式的幻想。遗憾的是，同样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甚至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在“制度主义”破产后，历史上的苏联以及当下的中国都认识到对于所要追求的“主义”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在经济而非政治，于是提出将彻底改变经济落后面貌作为主要任务。

然而，仅仅是经济吗？或者说，难道有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就能够保证“主义”目标的顺利实现吗？

与经济增长、政治制度比较，文化无疑“软”而又“软”。因此，国内曾经有学者将文化讥讽为“脂肪”一样的东西，而对社会进行文化分析的行为则如同在“文化脂肪上搔痒”。诚然，在社会这个特殊有机体内——马克思经常将社会比作有机体，有些东西如同骨骼一样重要、有些则如同肌肉一样不可缺少；而文化如果属于“脂肪”，那也确实是有可无、宁少勿多。不过，如果真的是“脂肪”，又如何解释文化之于一

个民族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民族在根本上都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即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具有独特的文化是其基本属性。另外,又如何解释人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总是受思想、激情、道德以及习俗、习惯乃至文化心理的支配这一显著特点?更何况:任何社会都是“人”的社会,任何制度都是由一定社会的“人”来制定并推动其运行或发生作用。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承载,作为社会主体之“人”岂非行尸走肉一般?而没有文化的社会,难道还能够成为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

文化是很“软”。但文化之“软”不是脂肪之软而无用,而是血液之软、精神之软、灵魂之软;对于社会有机体,这样的软既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同时又是“生命”得以维系、风貌得以光彩的根源。对于落后国家的“后革命时代”,这种似软实坚的文化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20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即使从制度建设角度考虑,列宁最后遗言中的下述观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①

重要的是,怎样正确认识落后国家的文化状况?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其建设任务、发展目标与实际的文化水平之间关系究竟如何?倘若存在差距,该怎样描绘或概括?以及:

处于领导或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在文化上是否就必然“先进”?为什么在“后革命时代”,在领袖人物政治面貌、制度设计及具体进程等方面,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大同小异?如果共产党也会受到旧文化的严重制约,其状态怎样、后果如何?

①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5页。

回顾历史,苏联与中国都很重视文化建设——无论社会文化建设还是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但为什么在多数情况下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后革命时代”落后国家的文化建设究竟存在怎样的规律?特别是如何抓好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

这些问题时常困惑着人们。同时大体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使“文化”这一本来似乎很虚、很软的东西,竟然成为落后国家在“后革命时代”必然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重要历史主题。

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世界上第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列宁首先面临“后革命时代”的上述“文化主题”。那么,他是如何思考、如何认识、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

理论兴趣、学术好奇,再加上某种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意识,驱使笔者进行这番阅读和研究。

四

本书的研究与写作虽然基本属于“单打独斗”性质,^①但始终获得其他方面的关心与帮助:

课题申报立项及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全军社会科学规划办以及作者所在单位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若没有他们提供资金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很可能会使“发现”最终落得“胎死腹中”的结果。

本书的部分观点曾经在国际、国内多次学术会议的发言中表达过,并通过和与会专家的讨论获得完善;也有部分内容曾经作为阶段性研究成果,发表于《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学习论坛》、《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等杂志。由此所获得的无论鼓励还是批评,都成为我努

① 根据分工,课题组其他成员主要集中力量完成另一最终成果:《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理论探讨》。

力的不竭动力。

基本思路来源于10余年的研究生教学,长期的教学相长活动使我受益良多;尤其是张政、孙勇、闵文亮、郭秀清、朱卫兵等同学,还为本书的写作、课题结项和整理出版作出了贡献。

除了表达上述致谢,本书出版之际尤其要衷心感谢:

中央编译局的胡文建研究员、北京大学的张光明教授以及中央组织部的陈林先生等人,正是他们在10年前对于拙文的充分肯定,激起我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和勇气;

我的硕士生导师吕裕国先生——对列宁那段话的疑问最初就是向他提出的,承蒙先生宽厚仁爱,非但没有加以痛斥或批评,反而是鼓励与肯定;

从第一篇论文即《列宁“遗嘱”的文化内涵》开始,部分阶段成果的发表都曾经获得过上海社会科学院李申女士的热心帮助……

五

尽管喜欢读书、也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并做些研究性工作,但经常并不十分热衷于出版或发表。兴趣与好奇推动了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而某种政治责任感,又促使我努力将获得的一些认识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并有所收益,于是才有了本书的出版。本书的出版在我个人,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或许是我进行此类研究与写作的最后一本著作——以后当然还会写书并且也还会有著作出版,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可能都会存在很大不同。

记得七年前的春天,也曾经为自己即将出版的同类型著作写序。在那篇“自序”的结尾部分,本人曾经颇有几分动情地写道:

“写完这篇序言,阳春三月的晨光已经洒满庭院。窗外满树桃花开得正盛、小鸟在翠竹间欢跳,几株芭蕉争相向人们炫耀着嫩

绿的骄傲……

……

……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无论对于世界还是我个人。太阳照旧升起。无论如何,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既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每一日,同时又是更加灿烂、更加符合人类生活愿望的、一个新生的春天……”^①

这,大体是当时现实生活和个人心情的真实反映。我深知自己是一个容易为现实所感染、为情绪所左右的人。

时隔七年,春光依旧;物是人非,岁月永恒。

过去的,真的能够成为过去吗?无论对于世界或者个人,尤其是一个国家。

在前面等待着我们——人类或个人的,肯定会有挑战与风险——甚至非常巨大,但之后必然就是更加灿烂的、充满温馨与浪漫的春天吗?

……

此时此刻,突然想到了梁漱溟先生,想到了这位世纪老人生前最后的疑问……

2011年4月16日,于沪上五竹斋

^① 韦定广:《“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第11页。

目 录

自 序	(1)
导 论 文化视野下的“主义”与“问题”	(1)
一、俄罗斯文化:组合与积淀	(5)
1. 东正教信仰	(10)
2. 蒙古人入侵的“文化基因”	(16)
3. 村社传统	(20)
4. 西方化及其矛盾	(24)
二、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西欧视角	(29)
1. 社会变迁不同类型及相关分析	(29)
2. 社会:传统与现代	(31)
3. 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马克思和韦伯	(36)
4. “不通过”及其文化根据	(39)
三、“东方”及其“文化”:列宁的思考与贡献	(45)
1. “东方”及其在俄罗斯	(45)
2. 作为概念的“文化”:列宁及其他	(53)
3. 学术层面的不足与意义	(64)
四、“读懂列宁”:面对“主义”与“问题”困惑	(68)
五、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	(78)
1. “文化自觉”:知性与感性	(79)

2. 思想创造及其梳理的内在逻辑	(87)
第1章 传统与现代:1893—1916年思想论战的文化纬度	(93)
一、民粹主义:反现代的乌托邦	(97)
1. “全欧洲浪漫主义的俄国变种”	(111)
2. “错误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120)
二、资本主义:一种“肯定的巨大文化力量”	(134)
1. “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派别	(134)
2. 文化进步性:相比较的结论	(141)
3. 资本主义:作为文明及其文化	(146)
三、民族、民族主义中的文化:一般与特殊	(157)
1. “国语”能否“强制”?	(169)
2. 民族文化:一种还是两种?	(172)
3. 民族文化自治:“极不现实的空想”	(175)
4. 文化国际化与“国际主义文化”	(177)
第2章 “革命”及其文化“后遗症”	(183)
一、革命与文化关系的不同阐释	(186)
1. 马克思的认识:政治文化心理	(188)
2. “革命”的必然性与特殊性	(190)
3. 文化对革命的不同影响	(198)
二、“文盲帮助了革命”?	(204)
三、“用谁的手建设共产主义”?	(218)
1. 隐型文化:从乐观到清醒	(219)
2. 后革命时期文化:状况及其地位	(223)
四、“滞后”或“脱节”:革命后文化制约问题	(234)
1. 是“滞后”,还是“脱节”?	(234)
2. 文化制约革命:性质与道路	(240)

第3章 经济建设的文化困境及其选择	(250)
一、“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文化原因	(252)
二、公有制的文化限定	(262)
1.“经济决定”文化内涵:马克思的分析	(263)
2.文化制约共产主义:列宁的认识	(267)
三、工作重心转移:是经济,还是文化?	(278)
1.“我们”是谁?	(279)
2.“链条”的关键环节	(284)
四、克服“中非居民心理”	(289)
1.“中非居民心理”:由来及其表现	(290)
2.学会工作	(296)
3.国家资本主义的文化意义	(299)
五、拒绝“感情社会主义”	(302)
1.“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	(304)
2.“欧洲方式”的文化要求	(307)
第4章 俄共(布)执政的文化“被征服危险”	(310)
一、分析视点转移	(314)
1.从乡村农民到城市工人	(316)
2.从普通群众到共产党员	(319)
3.从一般党员到中央高层	(324)
二、“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	(329)
1.“官僚制度复活”:认识过程	(329)
2.文化根源:显型与隐型	(333)
三、“苍蝇沉没在牛奶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344)
1.“大俄罗斯共产党人”中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344)
2.格鲁吉亚事件	(353)

3. 彻底的文化批判:“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	(357)
四、“奥勃洛摩夫精神”:民族性的另一面	(362)
五、“无法纪的海洋”及其他	(369)
1. 坚持法制:为了“维护和创立文明”	(370)
2. “最后的斗争”	(376)
六、结论:“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388)
第5章 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建设:“革命”或启蒙	(392)
一、“无产阶级文化”问题	(394)
1. 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	(394)
2. 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404)
3. “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	(409)
二、“文化革命”:意蕴、向度、方法	(413)
1. 背景分析:从实际出发	(414)
2. 是“革命”,还是启蒙?	(418)
3. 改善教师地位:“用不着证明的真理”	(427)
4. 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划时代的主要任务”	(433)
三、执政党:文化领导与自身文化建设	(438)
结束语 历史的验证及其思考	(446)
参考文献	(454)

导论 文化视野下的“主义”与“问题”

“俄罗斯共产主义,假如对它了解得更深些,在俄罗斯历史命运的世界里,是俄罗斯思想、俄罗斯弥赛亚和普济主义的变形,是俄罗斯对真理王国的探索,是俄罗斯在战争氛围中所接受和分解的纯正形式的思想变形。但是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传统的联系较之习惯了解的更紧密,传统不仅有好的,而且还有非常坏的。”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①

“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中,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说到底,是人在变迁。……社会进步是一定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出现的地方,变迁就会发生;在缺少这些因素的地方,停滞就会产生。这一理论不是将焦点集中在技术或环境的因素上、想法上、结构条件上或社会冲突上,而是将焦点放在具有独特个性特征的个体身上。”

[美]史蒂文·瓦戈^②

①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② [美]史蒂文·瓦戈(Steven Vago):《社会变迁》(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无论人类文明未来行程如何,这一时刻注定将被历史记忆——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8分,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上空,缀有镰刀和锤子图案的苏联红色国旗飘然而降,而白、蓝、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徐徐升起。由此,曾经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解体;曾经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自豪的国家的历史结束了;而在此之前几个月苏联共产党,这个在世界政党史上曾经执政时间最长的大党、老党,也已经彻底丧失其执政地位……

这个事件所喻示、所包含的,或许远不止这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激发起人们兴趣与注意力的,是对原因的探讨:直接、间接;国际、国内,以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回顾事件全过程,戈尔巴乔夫作为当时在任的苏联总统以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无疑应负有最为直接的责任。但是,仅仅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原因所导致的吗?甚至,在个人专权、党内腐败、民族矛盾激化、经济滑坡等问题的背后,难道不都存在着一个更为根本的,即制度方面的原因吗?正如邓小平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对斯大林错误的评价一样:“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①那么,特定的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制度本身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亚·尼·雅科夫列夫,这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在事件发生三年之后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

“为什么会如此?看来,答案不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在其诱人的乌托邦观点中寻找,也还要从俄罗斯现实的特点中去寻找。

譬如说,从未有过法治、从未有过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能够知道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